

翻开厚厚的党史资料，听着人们对革命烈士的讲述，我的心灵受到震撼，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成为共产党人的不朽楷模。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抗战时期文水县三位革命先烈的故事。

钢铁铸就英雄心

□ 梁振明

李袖清

高官厚禄不动心

李袖清，文水县东城村人，190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年少聪慧，读书认真，成绩常列榜首。后来，李袖清考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，刻苦钻研科学知识，立志报效国家。大学毕业后，李袖清到晋南棉业改进所从事改土、治虫的研究工作。

1937年，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大举侵华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对日军的侵略采取消极抵抗态度，却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多方掣肘。1938年2月15日，日军侵占文水城，其侵占前后的一系列暴行，激起他对日寇的无比仇恨。

侵占文水的日军为了实施其“以华治华”的阴谋，在全县物色有名望的人

出任伪县长，最后，把目标锁定在李袖清身上。日寇给李袖清许以高薪，但性情耿直、爱憎分明的李袖清，识破了敌人的阴谋，便严词拒绝了敌人。

1938年4月，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，县长顾永田特意登门拜访李袖清，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和县委的民主改革措施，动员他出任县水利局局长。李袖清听了顾县长的讲述后，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，从此认准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，当即接受了顾县长的聘任。由于他政绩显著、忠心报国，1942年10月，李袖清被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。

1941年2月，文水县平川地区被日

军侵占，李袖清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，在斗争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，把自己的家作为党在敌占区的交通站，想方设法接待好山上下来的同志，并且自掏腰包为山上的同志购买油印机、药品及生活急需品，把自己的积蓄用在抗日救国上。

由于李袖清的名声大，党组织安排他转入地下活动。1943年，由于同窗学友、充当太原日伪中央调查部情报员的吕善卿告密，他不幸被捕，被押在文水城日军笠原大队部。敌人对他用尽各种酷刑，却始终得不到半点关于抗战的秘密。敌人见用硬的不成，又改用高官厚禄来引诱李袖清投降，但仍然动摇不了他坚决抗日的决心。

1944年1月17日，敌人残忍杀害了年仅42岁的李袖清。殉难时，他高呼：“打倒日本法西斯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喊声震天动地。

韩大林

革命意志坚如钢

山还曾赠给他一件狐皮大衣。

韩大林回晋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，受到山西省当局的压制，阎锡山曾两次派人到石永镇搜查他的革命书籍。

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韩大林参加了文水县抗日政府领导的抗日教育工作，到苏家堡任教，担任抗日教师小组长。他积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，教唱抗日歌曲，自编抗日教材。为了防备日伪军的搜查，韩大林和学生们将凳子下的砖做成活动的，一旦有日伪军进村，就将抗日课本压在凳子下的砖底下，使敌人发现不了。

1942年，日军实行第五次“强化治

安”时，韩大林不幸被捕。日军对韩大林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，妄图迫使这位爱国志士屈服。见重刑未能让他屈服，日军又改用感化政策，向他灌输“中日亲善”“东亚共荣圈”等思想。韩大林与日军展开了义正词严的辩论，他用日军侵占文水后的罪行，批驳了“中日亲善”的虚伪，揭露了“东亚共荣圈”的骗局。理屈词穷的敌人恼羞成怒，在韩大林嘴上扎出窟窿，还给他的嘴锁上了铁锁，不让他说话，就这样，这位坚贞不屈的爱国志士被敌人折磨致死，尸体被扔到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灰渣坡上。

举，于是把他的衣服全部剥光，罚他赤身裸体地站在寒风中。时值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，魏元晋冻得瑟瑟发抖，却始终没有透露八路军半点秘密。

见魏元晋没屈服，敌人又提了一壶开水，往他嘴里灌，烫得他痛不欲生，却仍咬紧牙关不肯屈服。丧心病狂的日军又抱来一大堆高粱秆，点燃后把魏元晋扔进火堆里焚烧。熊熊的烈火中，他的衣服和皮肉被烧得滋滋作响，阵阵焦糊味弥漫开来。魏元晋拼尽全力从火堆里挣扎着爬出来，残忍的敌人又把他扔了进去。这样反复几次，魏元晋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敌人仍不罢休，又命令4个日军把他抬起来，架在火堆上熏烤，他还是不承认村里有八路军。

最终，恼羞成怒的敌人用刺刀在魏元晋身上连捅数刀。为了保护隐藏的几名八路军和抗日干部，魏元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他，很平凡，只是一位普通的教书先生；他，又很不平凡，面对强敌，敢于亮剑，以慷慨就义的壮举撑起民族脊梁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涌现出无数共赴国难、大义凛然的仁人志士，兴县著名教育家白文喆便是其中之一。面对日寇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，白文喆威武不屈、慷慨就义，充分彰显出老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，其事迹至今在晋绥红色根据地广为传颂！

白文喆，字双峰，1868年（清同治七年）生于兴县蔚汾镇乔家沟“旗杆院”白氏祖宅。白家是书香门第，祖辈为耕读世家。白家的客厅门两旁悬挂着两幅金字治家楹联，上联为“忠孝两字传家国”，下联为“万卷诗书教子孙”，座右铭是“读书最乐，为善最高”。白文喆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知识熏陶的氛围中长大的，16岁考中廪生，后经府试选拔为岁贡，成为兴县晚清进士温亮珠的得意门生。

白文喆一生酷爱书法，嗜书成癖，家里书房四周全部由书架构筑而成。他熟读“四书五经”，在中国历史方面造诣颇深。他读书虽多，却不拘泥于前人的条条框框，反对浮夸虚构的文风，主张写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，这种治学态度也塑造了其孤傲耿直的秉性，因此，在文人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刘训山先生编撰《兴县新志》时，曾多次向白文喆请教；兴县中学文史教师刘菊初（清末离石县贡元）将孙嘉淦的《南游记》注释完毕后，曾数次送交白文喆审阅、修正。白文喆不仅认真细致审核文稿，而且凭借丰富的知识，对文稿中的多处语法错误、修辞表达及标点使用一一予以纠正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，清政府下令，要求各地大办学堂，培养人才。白文喆与本县一些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一起创办了崑山书院（原址在今兴县初级中学旁），广招人才，兴学育人，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。学堂设有国文、地理、历史等学科，来自陕西神木、府谷、临县、方山、岢岚、五寨、岚县、保德等地方的学子纷纷前来就读。崑山书院存续期间，为兴县及周边县市培育出了大量优秀人才。老师们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，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，鼓励学生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。牛友兰、孙良臣、刘少白、刘训山、温宪珪、张立等这些崑山书院的优秀学子们，在老师们的教诲下扶危济困，与共产党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，他们的事迹成为崑山书院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篇章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血洗兴县县城，崑山书院也未能幸免，惨遭焚烧，片瓦不存。白文喆携全家六七口人（最小的婴儿还在襁褓之中），前往奥家湾乡的一个偏僻山沟——太平沟避难。他带着大量书籍和家眷躲藏在一个废弃的土窑洞中，本以为太平沟会是太平的，不曾想日寇顺着山脊从岚县偷袭兴县而来，第一站就来到了太平沟村。当时正值隆冬，天下着大雪，村民们见日寇进村了，纷纷四处逃散。白文喆的老伴得了伤寒病，她怕传染给村民，就只让儿子、儿媳和孙辈们跟着老乡一起躲在一处山崖中，她和老伴白文喆相互搀扶着藏身在一处山崖下。日寇进村后四处烧、杀、掠、抢，见村民就杀。在山崖下，日寇抓住了白文喆和他老伴，让他带路，到村庄屠杀老百姓。白文喆听后大声呵斥道：“‘小鬼子’，我堂堂一个中国人，岂能为犯我国土、辱我同胞的敌人带路，去残害更多的乡亲们？死不可怕，当汉奸、卖国贼决不可能。”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，白文喆敞衣露出胸膛，说道：“要杀就朝这里开枪吧！”日寇气急败坏地叫嚣着，挥舞着枪支朝白文喆胸膛连刺数刀，残忍地杀害了他和老伴。

那次日寇在太平沟村共杀害了63位无辜百姓。之后，一区委在孙家崖村为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，兴县县委、宣传部部长沈越，区委书记马柏树亲自到会为死难者一一立了牌位，追悼会开得简朴而隆重。会上，沈越部长表扬了白文喆在凶残的“小鬼子”面前宁死不屈、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，盛赞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老贡生、老英雄。

铮铮铁骨 展浩然正气

——追忆兴县著名教育家白文喆

□ 白士宝

魏元晋

铁血丹心护山河

魏元晋，1895年出生于文水县大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8年2月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文水大地，地处平川的大象村成了日军的占领区。魏元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感召下，在地下党和牺盟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引导下，积极投身抗日活动。

1939年秋，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，魏元晋被群众推选为大象村副村长，负责为抗日政府征集军粮、军鞋、收集情报和接待抗日工作人员等工作。

1942年1月20日，祁县、太谷、交城、文水、平遥五县的日军同时出动，对文水平川进行扫荡。当时五区青救会的崔山（即史平）、范志远等十几名工作人员在大象村隐蔽着。为了保护这些同志，魏元晋

把范志远安排到一家粉坊当漏粉工人，将崔山安排到豆腐坊做豆腐，其他同志也都做了妥善安排。这时，来自祁县的日军如狼似虎般地闯进大象村，挨家挨户搜捕八路军，寻找魏元晋，并扬言如果魏元晋不到村公所，就要在全村放火杀人。

为了保护村民的安全，魏元晋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走进村公所，只见日军已将村公所其他人员捆绑吊打，随即就把他和这些被捆绑的人一同押往大庙。在大庙前，日军威胁村民说：“你们村里藏着‘八路’，你们要赶快交出来。”敌人连续向在场群众逼问，可谁也不吭声。日军便把魏元晋拉过来，逼他交代。他回答说：“我村没有八路军，在场的都是良民百姓。”敌人见魏元晋不检

李袖清、韩大林和魏元晋三位英雄牺牲了，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党的旗帜，浸透了文水的土地；他们对党和民族事业无限忠诚的钢铁信念，将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，激励着当代青少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勇毅前行。

红色记忆

吕梁故事